

【观展所得】

CLE中国授权展： 看文博IP怎么玩文创

□刘其

“跨界新生态，让文物活起来”！本月17日—19日，第16届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简称“CLE中国授权展”）在上海举办，吸引了国内外两千余家全品类IP/机构参展，其中不乏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

众所周知，博物馆不仅是文化场所，更是天然的文化资源大IP。越来越多博物馆走出了围墙，进行跨界合作。而亚洲规模最大的CLE中国授权展，则是博物馆进行跨界合作的首选平台。

2023年，是恭王府博物馆创建的第40个年头。作为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今年恭王府博物馆会在40周年纪念活动中推出一项重要文旅融合项目，即“恭王府·安善堂”。在本届CLE中国授权展中，恭王府博物馆展区以即将落成的“恭王府·安善堂”中四季万福厅作为展区原型，圆形展览空间分为内外两层布局。观众绕竹拾级而上，进入外环展示空间，顺时针穿过春、夏、秋、冬四季，对应四时福庆的书法，映射地面铭刻之二十四节气。这个项目将中华传统“福文化”贯穿始终，配以二十四节气元素，传达天地人和的美好寓意，并展出了二十五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恭王府文创精品。

在博物馆展品IP文创方面一直走在前沿的国博，早已有了自己的文创商业品牌“国博衍艺”，从2016年开始国博已就“馆藏IP+互联网”进行深度融合，积极开展IP授权合作。目前，“国博衍艺”已与近百个品牌开展授权合作，既有能体现文物原本风貌的复刻卷轴、网红冰箱贴，也有满足互动需求的榫卯积木、DIY涂鸦玩具、绘画礼盒，涵盖衣、食、住、行等方面。例如联合国内顶尖密室逃脱创意团队开发首部文物主题互动解谜游戏书《博乐·元宵行乐》；以馆藏战国时期的“夔龙玉佩”为原型，设计推出国家博物馆首款潮流IP“夔九”；将馆藏“星空图”设计进年轻时尚的运动防晒衣……在本次展览中，“国博衍艺”中的展品包括限量版国博口红，这也是国内博物馆界最早授权的文创产品，并利用国博馆藏《海晏河清图》的元素进行外观设计；还有与派克联合设计的钢笔，选取说唱俑造型进行二次创作，包装分别为“为你打CALL”及“为你比心”。此外，作为国博旗舰店的“镇店之宝”，龙形金步摇夜光书签造型小巧，纹饰雅致，其设计灵感来自国博藏品镀金点翠鸟架步摇。

当博物馆的“物”与“思想”碰撞后产生化学效应，在提升大众文化参与感的同时，博物馆2.0时代也就真正到来了。IP

商业授权作为博物馆文创开发的模式之一，目前已初步形成商业化产业链结构。

在展览现场，故宫博物院展区非常好辨认，故宫红的颜色就是最亮眼的标志。近年来，淘宝、京东、腾讯等大型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故宫IP，在文创圈有句话颇为流行，“得故宫IP者，得天下”。故宫IP不仅是明清两代的宫殿建筑，所含藏品几乎已经包括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各个门类。近年来，故宫将文物与大众生活方式、藏品文化信息、优秀的创意设计以及优质的制造供应链结合在一起，其文创产品屡出爆款。例如和饮料公司合作推出“故宫瓶”，将故宫馆藏的画卷和文物印到饮用水瓶身上，每款瓶身图案各不相同，令人惊艳；和银行联合推出借记卡产品，以让“中华传统文化活起来”为主旨，在卡面运用故宫建筑与文物来展现博大精深瑰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2017年中国授权展首次开设中国文博授权展区以来，博物馆就成为授权展区的特色之一。而从国外博物馆IP授权和文创开发的进阶之路，我们更可以借鉴到很多东西。以凡·高博物馆为例，作为当之无愧的超级大IP，从凡·高各个版本的自传，到琳琅满目的衍生产品，再到人气爆棚的数字巡回展览……凡·高的故事通过一个又一个介质在凡·高迷之间复制、流传。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的《遇见大师》收藏卡牌套装共有188件作品，融入全新独占工艺与多元收藏玩法，串起从15世纪文艺复兴至19世纪后印象派的发展脉络，呈现一部浓缩版欧洲绘画史，自然收获了众多用户关注。

早在2020年，来自东西两座魔都的宝藏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官宣出道：以“礼遇东西”为主题，甄选两家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开发出“守护”“缘满”“大师”“传承”四大主题系列，通过品牌授权、文创礼品、互动体验等丰富多元的形式，让大家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体验到来自世界的文化艺术珍品，实现东西文明遥相致意。上海博物馆被誉为东方文化的荟萃之地，百万件藏品纵横华夏历史；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超过150万件藏品，囊括世界文明，尽显时尚与包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两座博物馆就结下不解之缘。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展中，上海博物馆出借了主要藏品，同期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赴纽约访问交流，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选址有感，埋下了在市中心的公园旁建立博物馆的梦想。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开馆，就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旁。新馆中书画厅的展陈模式启发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厅的展陈。



□周惠斌

战国末期，秦楚争霸天下，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秦国为取得胜利，从三个方面对楚国采取谋略攻伐：一是在正面战场展开军事进攻，不断蚕食楚国土地；二是通过外交手段，以连横策略瓦解楚齐联盟，剪除楚国羽翼；三是以“巫术邪法”，安排巫师在名山大川神前祭祀祈祷，历数楚王罪孽、诅咒楚国败亡，并刻文勒石，埋于土中。其中这最后一种，即秦王祈求天神诅咒楚国、降祸楚师的祝祷文及其刻石，被后世统称为《诅楚文》，与享有“石刻之祖”美誉的先秦《石鼓文》齐名，深受历代学者瞩目。

《诅楚文》相较于先秦其他石刻文字，内容最易读易解，其大意是：秦穆公和楚成王当年通婚结婚，订下子孙万世母相不利的盟约。如今，楚王违约，结盟诸侯伐秦，秦王因此遣使宗祝（官职名，掌祷告祖宗及鬼神）到名山大川求告神灵，祈求让楚国接受惩罚。所谓“诅”，就是“咒”的意思，即诅咒楚国失败。当时“诅”有两种，其一便是先结“盟”后加“诅”，即在神前立誓发咒，遵守盟约，若有违者，请神处罚。秦楚相争，最后以秦胜楚败而告终。秦国战胜楚国，与《诅楚文》自然毫无关系，其内容夸大不实、荒诞不经，但奇谲诡秘的构成和演绎，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诅楚文》刻石共三块，字数稍有参差，文句首尾略异，内容基本相同，后人根据所祈神名不同，分别命名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

《告巫咸文》石刻（今存326字，有34字漫漶不可辨认），在北宋仁宗时期出土于凤翔（秦国都城，古称雍城）开元寺，“巫咸”为巫师的祖师。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将此石移至知府便厅，赋《诅楚文诗》并作序以纪，宋徽宗后又将它收归御府。

《告大沈厥湫文》石刻（今存318

字），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在朝那湫（古称雷泽，为伏羲出生地，今甘肃平凉）旁为农民耕田掘得，“大沈厥湫”是水中之神。熙宁元年，渭州知州蔡挺将此石移至官廨。5年后，他调任南京时携石而往，藏于住宅。绍兴八年，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又移至官廨。

《告亚驼文》石刻，据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记载：它于北宋时期“出于洛（今正宁县东），亦蔡氏（蔡挺）得之，后藏洛阳刘忱家。”宋代董道《广川书跋》指出：“亚驼即滹沱”。但后人多有疑议，认为它是伪刻贗品。一是滹沱水在今河北，何以此石出土于洛阳？二是洛阳并非秦地，怎会埋葬秦国石刻？郭沫若据此认为，文中驼字从“马”，写法不古，因此断言是伪作；而且南宋《绉帖》《汝帖》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亚驼》，蔡挺得后也未将它同《告大沈厥湫文》一起带至南京，显然，宋人已然知道它并非真品。

《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后，因记载了历代文献中缺失的史实，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关注；又因刻勒时代不见史书记载，故后世学者对此争论颇为激烈，如宋代方勺在《泊宅篇·秦诅楚文跋尾》、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秦祀巫咸神文》、王柏（鲁斋）在《诅楚文辞并序》中，纷纷题咏、著录、注释、考订，发表各自见解。现普遍认同《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此外，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对《诅楚文》评价甚高，米芾在《自叙帖》中说：“篆最爱《诅楚》《石鼓文》。”董道誉之：“书尽奇古，间存钟鼎遗制，抑或杂有秦文，盖书画始变者也……文辞简古，犹有三代余习，非《之罘》《琅邪》可况后先，此其可为可传也。”明代何景明的《观石鼓歌》赞曰：“《之罘》《琅邪》几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战之后，《诅楚文》三块石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无踪影。因此，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其中以南宋《绉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则略有删节。元代至正年间，周伯琦刊印的“元至正吴刊本”，不乏古意，为现存摹刻本中的最善本。民国时期，《诅楚文》的刊印本较多，如1934年容庚的《古石刻拾零》中收录了《绉帖》《汝帖》两本；1944年吴公望影印“元至正吴刊本”，三石俱全，各自成文，为现今所见最完整的拓本影印；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亦收录《绉帖》《汝帖》的翻刻拓本。

《诅楚文》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方正朴茂，笔画匀称；结体粗细不一，欹侧多变；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用笔收放自如，风貌接近秦代小篆，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因而受到历代书家的钟爱，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字和书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书法价值。



秦《诅楚文》拓本（局部）

【短史记】

《诅楚文》的诡谲身世和传奇经历